青年批评的整体趋势与潜在挑战

□徐 勇

一、青年批评的制度建设和保障

关于十年来的青年批评，有两个事件不可不提。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搭建（2011），一个是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设立（2003）。两者都聚焦青年和青年批评，彼此之间互为补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当代青年批评的顺利展开和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迄今历时11年，共十届，遴选出100位优秀青年批评家，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青年批评的重镇与生力军。

这里之所以要把两个事件放在一起分析，是因为这两个事件既标志着青年批评的制度保障的建立，也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当前青年批评的整体面貌及其历时走向。说其为制度保障是指，这两个事件为青年批评的有效展开和青年批评家的顺利成长，搭建了重要平台。而说其形塑了青年批评的整体面貌及其历时走向则是指，青年批评的成员构成、批评模式和身份认同等等都与这两个事件息息相关。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强调并凸显学院批评和非学院批评（或作协批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区分，这固然是出于专业分工或职业分工的需要，但也在无形中严重束缚并阻碍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可以说，正是前面两个事件（制度）的实践，切实地打破了这一壁垒，真正实现了两种批评的有效结合与研究和批评的一体化。

历史地看，学院批评和非学院批评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两者之间若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和互文关系，对文学批评的有效展开确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事实是，学院批评越来越封闭于学院体制之内，有演变成自说自话的知识生产的趋势；而非学院批评则表现出对理论的拒绝和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不够重视，两者之间有渐行渐远的倾向。两个制度都聚焦青年，并且把学院派批评家和非学院派批评家同等对待，对这一壁垒的打破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一平台（因为是依托中国作协），可以很好地实现文学批评和创作之间的有效互动，使得文学批评真正介入文坛并同文坛保持良好互动成为了可能。至于说研究和批评的界限被打破，是因为这两个制度都刻意抹平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界限，既把两类身份（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混同起来对待，也把两类文章同等对待。这其实是告诉我们，优秀的批评文章，当是建基于良好的文学史视野和眼光之上，同样，优秀的文学史研究文章，如果没有敏锐的批评意识，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

就青年批评的有效展开论，这两个制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们所起的示范引领作用。可以说，正是在这两个事件的带动下，还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等事件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平台建设、奖励机制以及签约评论家制度等等为重要形式的青年批评制度，青年批评正朝纵深发展的态势前进，涌现出了一大批活跃和有影响的青年批评家。就年龄构成看，活跃于近十年的青年批评家，大致以“70后”、“80后”和“90后”为主。

二、青年批评的总体特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年批评。十年来的青年批评，在切实打破学院批评和非学院批评、研究和批评之间的壁垒的同时，也表现出颇不同于上一代青年批评的地方，“命题导向”模式、对话意识的增强和同代人批评等三方面，是其最为集中的表征。

对上一代批评家，或上一个十年的青年批评而言，追求创新、新锐和思想性既是他们的自我期许，也是社会对他们的普遍期望和想象。或许也是因为世纪之交的转折，赋予了他们命名和建构的热情。他们身处潮流之中，既被潮流所推动，也把自己的行动有意作成潮流。这使得命名和建构社团流派，乃至制造话题，成为他们一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学批评可以称之为文学批评的“话题导向”。相比之下，刚刚过去的十年中的青年批评，则似乎显现出创新与锐气两皆不足的倾向。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点。其一，很大程度上与近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和缓态势有关。这十年来，底层文学作为一股思潮已渐趋式微，或者说已从思潮扩散成为题材和人物形象谱系叙事的一种。纯文学写作日益步入水流和缓的航道，虽成果不可小觑，但终究波澜不兴，这就使得文学批评的话题制造倾向难以为继。这一大的趋势，是青年批评创新和锐气两皆不足的重要背景。青年批评虽制造或设计了诸多话题，但都很少引起持续的关注或争论。其二，与青年批评家自己的身份意识和知识背景有关。这一代的青年批评家大多是学院出身，多为现当代文学专业、比较文学专业或文艺理论专业的硕博士。他们自觉地追求批评的学理性，力求做到公允、严谨和自洽，如此种种，都使得他们在面对鲜活和生动的文学创作时，多少表现出锐气不足、冲击力不够，甚至不乏学究气的特点。前一代青年批评家所主导的“话题导向”逐渐向“命题导向”转变。

所谓命题导向是指，批评家常常从某一作家作品入手或围绕某一作家作品，提出某些具有理论性或实践性的命题，据此援引相关的理论以期做深入的阐发和论证。命题不是话题。话题带有制造的成分，或为引起争论与争鸣，或意在建构某一流派或思潮；命名、建构和编辑选本是前一代批评家的重要工作。命题导向则倾向于作品和理论之间的互相阐发，其落脚点常常是在作品和理论之间的契合，或命题的提出与解答上，而不再属意于命名或建构。这一倾向，也可以称之为“追求批评的知识化”。（汪涌豪《批评的即时感与历史感——对青年批评家的瞩望》）与此相对应的，分类、细读（再解读）和跟踪阐释就成为十年来青年批评家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方式。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形成的是一种闭合式的结构，其所形成的是，追求严谨、偏向于理论化、学理性强、较少趣味，或者还可以说并不追求批评的“溢出效应”。近两年来，青年批评家开始向“出圈”的方向上努力。“文学脱口秀”成为青年批评的重要的生长点；相似的方式方法还有工作坊、直播间、新书分享会，以及公众号批评等等。这些都是新媒体或全媒体所带来的批评的新变。青年批评家在这方面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未来自然可期。

“命题导向”之外，十年来的青年批评还有一个倾向比较明显，那就是对话意识的增强。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批评最有代表性或症候性的特征。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青年批评家大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和使命感；时代的转折和现代化的呼唤也确实赋予了彼时的青年批评家这种豪气和使命。不破不立的现代性逻辑的驱动，使得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更多趋向于在新和旧之间不断做着区分和建构的工作。相比之下，这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其发展虽然呈不断加速的态势，但却没有出现思想和文化上的裂变。这种背景下，所谓转折、断裂或颠倒等观念，并不构成十年来青年批评的主线；相反，倒是延续、拓展或深化等观念，成为这一代青年批评的主导色。这使得青年批评（家）更多趋向于建设和“立”的工作。他们虽然有趋新的冲动和热情，有属于自己一代青年的使命感，但立意却更多是在建设、再造和赋能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当下的创作置于历时或历史的脉络，既给当下的价值增加了历史的重量，也立足当下重新做着历史价值的挖掘。这固然不免遭致非议和批评，似乎青年批评显示出创新不够、锐气不足、魄力不大的缺点；但须知，青年批评的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却是显明而卓著的。他们既是针对当下的创作展开批评，也是在建构当下和历史之间的连续性。这种立场使得他们对历史和当下，都多了一份宽容、一份理解，甚而体认；青年批评的对话意识的增强正是基于这个立场之上的。青年批评的对话意识的增强，既表现在同前代批评家的对话意识上，也表现为同历史和传统的对话意识上。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传统命题其实有着开放性的一面。传统的建构，固然常常与断裂和变革联系在一起，但同样也建基于连续和承续之上。青年批评很大程度是在民族复兴的意义上，做着传统的修复、承续和再造的工作——试图把当下作为传统的新的构成部分建立起来。他们建构起了文学传统的新的序列。这种建设工作，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更倾向于作家作品和题材主题的研究。他们在命名文学现象和建构文学潮流方面表现出来的热情，普遍不如前代批评家。因为毕竟，命名思潮和流派，其意常常在于革新和断裂的宣示上；他们更多看重的是姿态和立场，而不是实际创作情况。

对话意识的增强，也使青年批评多具有同代人批评的倾向。同代人批评并不是青年批评的专属特征，但在近十年的青年批评这里尤其突出。说其突出是因为，青年文学或青春写作是近十多年来常被谈及的热门话题，其之所以热门，一方面有媒体制造话题的缘故，一方面也与青春写作已然成为文学类型中的一个门类有关。对同代人的批评实践，某种程度上也使得青年批评备受关注。十年来，青年批评家不仅与同代作家一起成长，同时也表现出与同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对话意识上。这是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表现。所谓自觉是指，青年批评家十分清楚一点，即只有做同时代人的批评，才是青年批评的最好出路，因此他们会有意识地研究自己的同时代人。这使得青年批评家和青年作家之间构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但这种互动也可以说是哲学家阿甘本所推崇的“同时代性”理念的体现——他们既拥抱同代人的文学写作，同时也对同时代人的文学经验及其叙事倾向采取一种高度的清醒甚至批评的态度。所谓不自觉是指，青年批评家对自己同时代人的文学书写有某种特别的亲近感；他们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糅合了自己的经历、情感和体验，因此也就特别具有对话特征和批评的指向性。

这种同代人批评的现象，还表现在对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及时反应和有效阐释上。当网络文学或类型文学的高歌猛进已然超出了现有理论的阐释框架和评价系统时，如何同网络文学或类型文学保持一种等速度的有效认知、分类和阐释，作为一个现实和理论问题就被提出。在这方面，青年批评可谓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敏捷和敏锐，他们同网络文学或类型文学基本保持着一种同频不同振、同时不同代的辩证关系，为他们有效介入网络/类型文学现场并做出自己的体察提供了保障。

三、青年批评的不足

十年来，青年批评的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青年批评存在学养和修养上的后天不足现象。这种不足，既与青年批评家作品阅读量的不足有关，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所导致的。追求理论自觉及其理论的充分介入，会在无形之中忽略文学批评的相当重要的一环，即经典作品的深厚储备和当下作品的广泛阅读——青年批评家常常表现出对理论的极大兴趣和高度的敏感，而唯独对文学作品本身多有忽视。事实上，没有对经典和当下作品的广泛阅读作为基底，文学批评往往只会成为理论的附庸和为批评而批评。文学批评在青年批评家那里，因此常常表现出“理论过剩”和“过度阐释”的倾向：既不针对作品，也不具有现实指向或现实情怀。其结果，文学批评往往成为文学理论的操练所和试验场。

其次，青年批评的均质化现象比较突出，趣味性和风格化程度不够。这种同质化现象，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所带来的副产品。青年批评家倾向于作品和理论之间的互相阐释，而往往忽略作品本身的美感，或者说文学批评的个人品格，风格化的文学批评并不常见。这也使得青年批评的区分度不太明显。青年批评家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文学批评的展开，也是批评家个人才情与性情的表现。没有批评家个性与才情的显现或流露，文学批评常常只会成为学术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工具，独独与艺术无关。好的批评，是要充分揉入自己的体验、感情和才情进去的，即是说，是有风格的批评。

第三，青年批评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感不强。学理性、学院化和知识化，常常使得青年批评呈现出脱离现实的指向。如果说文学活动是由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所构成，作品同世界的关系，始终且一直都是读者包括批评家在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但青年批评家在这方面却多有忽略。青年批评，常常聚焦于文本内的耕耘和细读，或表现出超越现实的理论立场，唯独或常常缺少了现实针对性与时代感。所谓现实针对性与时代感，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对中国现实的阐释和有效言说，在这方面，青年批评显然力有不逮，明显表现出迟滞或失语的倾向。

四、青年批评的机遇和挑战

对今天的青年批评（家）来说，挑战和机遇同在。挑战和机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组关系中：一是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实现之间的关系，一是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与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之间的关系，一是风险的增长与对社会稳定的进步想象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能不能处理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关系，决定了青年批评和批评家可能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厚度。一个不能从当下汲取力量并从历史和未来的关系的角度赋予当下以价值的文学批评，往往是虚无的和不及物的；而如果只以未来或抽象的原则为视角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往往又是虚妄的和不切实际的。同样，一个不以民族国家的福祉为根基或依托的批评，显然又是虚伪的和不道德的。这其实就要求青年批评家：要有历史意识、使命担当和未来视野。只有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批评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成绩及经验

□郑 伟

在“五四”以来现代思想史的背景下，包括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国古典学研究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一条现代性转化的道路。学者们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内涵、构建古代文学批评史、更新古代文论研究范式等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由时代提出来的，到了20世纪末，中国文化界几乎从各个方面都感觉到一种“失语”的症状，与此同时，重建中国文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就落脚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议题之上。20余年来，从文化焦虑到文化自信，从民族本位立场到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复兴，这一议题始终占据着古代文论研究的中心地位，既是焦点，又是语境，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运思方向。

转化与阐释

“现代转化”是从世纪之交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开始的。学者们普遍地忧虑于中国话语创造性和表达力的衰退，将思考的重心从对西方理论的消化吸收转移到对本土思想资源的重新开掘与体验上来，提出了诸多现代转化的方案。虽然至今没有转化出完满的结果，但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其中最重要之处便是为古典学的研究增加了反思性的维度，促使人们去思考古代文论在话语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具有的民族根性，也带动了古代文论从封闭的知识体系建构转向开放的文化阐释，从局限在文学系统内部的言说转向大文学观念和国学通识视野，从依附于西方的言说转向中国话语的独立表达。“现代转化”热潮的最大成绩即在于此，它所提供的古代文论价值论研究的基调、文化阐释与对话的态度以及一种面对传统求更生的治学眼光，一直影响到今天。

最近十余年，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现代转化”的理论反思与观念构型之上。针对诸种转化方案的落空，学者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们先是觉得古今文化之间的异质性使得转化困难重重，后来又认为那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转化态度不可取，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我们自己关于“转化”的观念出现了问题。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在“转化”“转换”“融合”“重建”上抠字眼儿了，也很少谈论“分解”“比较”“激活”“综合”“创生”的方法论了，而是更多地使用了“对话”“交流”“碰撞”“体验”“沟通”这样的词汇。总之，不可能像盖房子那样拿来秦砖汉瓦当材料。当以往那种对待传统文化的资源型思维逐渐消退之后，所谓的“现代转化”又回到了“现代阐释”的道路上。

说起“阐释”，也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一段时间内，“现代阐释”被当成了“现代转化”的副产品，或者被用作“转化”目标没能实现的一个证据。后来，随着国内阐释学热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阐释”并不仅是一种面对现成客体所展开的还原性的知识解释行为，它更是价值和意义的生产、传递和流通的过程。随着阐释观念的更新，今天的学者已经能够释然地看待“转化”思潮中出现的一批冠以“×××的现代阐释”“×××的现代意义”等类似题目的论著了，他们甚至把“转化”的历程追溯到百余年古代文论批评史的早期阶段，并从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新传统和新话语。由此看待百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史，就内化在现代阐释的同一过程之中。以前把“阐释”当作“转化”的一个步骤，现在认为“转化”就在“阐释”之中，而任何“阐释”必然是“转化”。这种从“阐释→转换”到“阐释/转换”范式的确立，背后则是对相关议题从知识论、工具论的思考向价值论和现象学思维的转移，乃是近十年来的一个最大的理论创新。

由此带来的两点变化值得注意。一是在学术理念上，以往关于传统文化的对象化认知正在逐渐地让位于一种对话的、体验的阐释态度。长期以来，我们采取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古代文论，把它当作客体处理成一堆关于过去的知识，而研究者充当了知识的还原者的角色。无论见解多么高明，本质上都是对过去的翻译式再现，并没有真正地涉及价值和意义的发现。因为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把古代文论做成死物之后，还要苛求复活它的现代性，压根儿就不符合逻辑。现代转化的很多方案之所以落空，一个根本的症结就在这里。“阐释”则不同，它的精髓在于古今之间体验关系的达成，目的不是还原知识，而是生产意义。只有解除了主客体之间的那种介入式的、对象化的认知关系，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才能够被今天的人理解到；也只有把古代文论当作活物，才能够继续谈论现代转化的问题。

二是我们看待传统的思维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究竟什么是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问的角度。以前，传统被理解为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一种超稳定的思想结构，或者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比如谈到儒家文学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马上就会浮现诸如温柔敦厚、含蓄中和、尚质尚用之类刻板的印象。这些认识固然也正确，但由于缺乏一种古今对话的态度，它们被隔离在当下生活之外，成为了只属于过去的传统。试问，今天的人们割裂地谈论着属于过去的传统，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它势必会严重地妨碍我们对中国文学意义空间的更深入探索。我们看到，“转化”思潮中产生了大量关于民族审美特性的知识，实际上并不比转化之前来得更加高明，原因就在这里，就在于人们对传统的理解存在着误区。学者们逐渐地意识到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毋宁说传统就存在于不断地被发现的过程之中，乃是当下意识所照亮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的认识在最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当下问题的研究，而那些关于传统的惯常认知往往是不可靠的。

传统的现代化

十余年来，随着“现代转化”的热潮逐渐消退，它就从一个学术焦点转变为学者们读书治学的眼光问题，因之构成了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潜在的语境。就拿这些年围绕王国维美学的相关争论来看，无论是西学移植说，还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更生说，都指向了王国维意境说的理论来源和文化身份，也都是在“传统的现代化”这一问题域中提出来的。其中，罗钢提出了“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的观点，认为意境并不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和最高理想，而是由王国维奠基，经过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人编织的一个学术神话，本质上是中国学者为了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所进行的一项现代化的工程，初衷是“传统的现代化”和“民族诗学传统认同”，结果却是“自我的他者化”和“西方美学传统认同”。罗先生一改之前做文化研究时的平稳风格，对意境说的见解和表达都相当的激进。他的一系列文章都似乎急于澄清世人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误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百年来西方话语入侵、民族文化主体性丧失的焦虑。这就足以启示我们去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论与美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该如何去选择当下中国文论建构的相关路径。同样的道理，反对“变体说”的学者们也是通过意境说来谈论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发生。只不过在他们看来，意境论固然借鉴了西方的理论思维，但表达的却是正宗的中国艺术经验。因而非但不是西方美学的变体，反倒更见得王国维、宗白华等人融会中西、自铸新语的典范意义；也没有丧失文化的主体性，反倒是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文论传统。剥开两方针锋相对的观点，实际上都遵循了同一个学术范式，那便是该如何理解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这多半取决于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观察位置之上，并且这个位置是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深谙西方的学者和精通古代的学者都在王国维美学中各取所需、自我强化，且不论意境说是中国固有的，还是西方移植过来的，都是在“现代转化”的同一个问题域下发生的，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期许是一致的。

在“传统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学、美学精神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到世纪之交的“转化热”，再到构筑新时代中国精神与文化自信，产生了一批旨在探索民族审美传统的论著。大概说来，在思想大解放的80年代，美学热少不得与西学热相互交织，相关古典美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学的强势影响，生搬硬套的痕迹还很明显。这种弊端很快就显示在“失语症”和“现代转化”的语境之下，由此启发了中西诗学、美学比较的学术热点，并带动学者们向着中西文化价值观及思维模式的纵深去挖掘。进入新时代，特别是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当前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讨论方兴未艾，器物美学、书画美学和美育实践研究受到重视，而“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成为了指导当下美学理论和文艺实践的重要命题。

与此同时，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关键词、元范畴和基本理论等老问题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焕发生机，总体上表现出从文学话语向文化话语研究、回到中华文明的母体之中去体会中国文学思想特质的发展趋势。正如刘毅青在《文明阐释视野下的中国文论重构》一文中指出的，中国现代以来面临着古今断裂的问题。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只有回到中国文明的源头，才能真正获得自身话语的理论资源，才能对当代文学构成批判意义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十余年来经学文艺思想研究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学者们联系经学的意义生产方式和话语实践方式来谈论经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互动及影响机制，解析这种关联在历史上的表现形态及其背后蕴含的时代精神与文人群体的身份观念，从中华大历史观念出发理解经学关联域中的中国文学品格，以期为当下中国话语建构和文化创新提供借鉴。一些研究成果突破了以往的那种背景式的、平行比较的方法论，对古代文论实践性、人民性和道义内涵的理解更加深刻，从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古典阐释学话语资源。

2014年张江发表《强制阐释论》，引发了关于中国当代阐释学话语建构的大讨论。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阐释学尤其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广泛传播及其影响，国内学者即发出建立本土阐释学的呼声。当初，学者们多少是有一些文化焦虑的，他们通过西方视野重新发现了极为丰富的中国古典阐释学资源，也感觉到建立中国本土阐释学的需要及诸种困惑。在当下，中华文化复兴谋求中国话语表达，这种需要无疑更加自觉了，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前景也更加清晰了。这个过程透过张江教授的一系列理论及其引发的学术热议来看，先是“强制阐释论”通过拆穿西方理论自身的“根本缺陷”，为中国话语的出场创造了条件；继而“公共阐释论”通过回返阐释的公共行为本质及其理性运行范式，从而展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阐释学的中国道路。现如今当我们再提“中国阐释学”的时候，它的思想义界、建构路径及其民族特性都远较当初的设想更为明朗和切实。在今天，中国阐释学话语之路超越了“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议题，并将当代中国文论建构从聚焦于对西方话语的消化吸收，明确地拉回到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去夯实其独立性的基础。这也启发了关于古代文论阐释学重构的学术热点。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应当走有别于西方的、体现中国传统的方法论阐释学道路。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包括古代文论之内的中国古典学传统蕴含有足以对视西方的哲学阐释学思想，只是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阐释学的中外话语资源、理论形态研究与文献整理》[19ZDA264]阶段成果）